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总策划 张余胜

俄蒙關係歷史檔案文獻集

(上册 1607—1636)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苏联] И. Я. 茲拉特金 主编

[苏联] М. И. 艾利曼 Г. И. 斯列萨尔丘克 著
马曼丽 胡尚哲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014055927

D851.29

11

V1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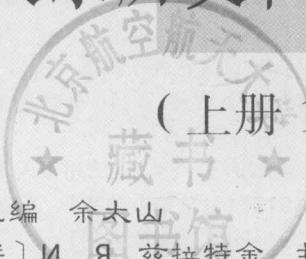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



(上册 1607—1636)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苏联] И. Я. 茲拉特金 主编

[苏联] М. И. 艾利曼 Г. И. 斯列萨尔丘克 著
马曼丽 胡尚哲 译

D851.29/11
V1



北航

C1743938

(译自东方文献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 / (苏) 戈利曼, (苏) 斯列萨尔丘克著 ; 马曼丽, 胡尚哲译.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5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 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4461-9

I. ①俄… II. ①戈… ②斯… ③马… ④胡… III.
①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汇编—俄罗斯、蒙古 IV.
①D851.29②D83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6096号

总策划 张余胜

策划编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马继萌 施援平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上册 1607—1636)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苏联]И. Я. 兹拉特金 主编

[苏联]М. И. 戈利曼 Г. И. 斯列萨尔丘克 著

马曼丽 胡尚哲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总印张 63.5

总字数 879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461-9

定 价 180.00元(上、下册)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淘宝网邮购地址:<http://lzuup.taobao.com>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任

陈高华

委员（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颀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珺 张东林

出版说明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洲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 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2010年6月30日

出版说明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学术界曾掀起一股研究早期俄蒙关系史、中俄关系史和卫拉特蒙古史、西北边疆史的热潮，并培养出一批这些领域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的成长无不与《准噶尔汗国史》《俄国、蒙古、中国》《17世纪俄蒙关系档案》等名著研究者提供的译文资料分不开。当这些已翻译出版或发表的资料几乎被挖掘殆尽之时，这些领域研究的黄金时代也就过去了。虽然这些受益于相关译文资料和其中俄文档案文献的有些学人深知档案文献的重要与珍贵，也知道苏俄著作中还有两本珍贵的《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原文著作，即本译著的原文，但苦于这两书都是用古俄文语法编写的，甚至一般懂俄文的学者也难于充分利用。加之国内古俄文译者比较少，且此原文著作国内藏本很少，发掘到的人也就不多……种种原因使这部分档案文献迟迟未能翻译出版。

2007年底，在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马大正先生（他也是当年那股研究热潮中脱颖而出，并且对卫拉特史和早期俄国档案文献情有独钟的知名人物）推荐下，我作为当年《准噶尔汗国史》的译者，因为能懂一点古俄文，又研究过一段卫拉特蒙古史，并且我和他各藏着前后两个档案文献原著，我们就决定尽快让这些文献档案陆续问世——我承担了为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这两本珍贵档案资料的任务。到2009年底，我已基本编译了其中相当部分的资料，但仍未能正式出版全书。想到翻译著作全文之艰难，我和助手又皆为此书翻译而造成视力大大减退，我们不禁有了知难而退的想法。

几年过去了，今年在余太山先生主编、施援平博士具体操作的“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丛书拟将这两本珍贵文献列入选题的激励下，我们一鼓作气，无视劳神伤目，又开始捡起这部古俄文档案的翻译工作。现

在，这两部古俄文档案文献终于啃下来了，虽然前前后后断断续续经历了6年，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两部《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终于问世了！

在这部译著问世之际，回想几年来的艰难历程，我感受到了马大正先生始终不弃不离地坚持发掘珍贵文献的学术精神，体验到余太山先生和施援平女士这套丛书敏锐的选题目光和学识风采，也被中国厄鲁特蒙古史学会一批蒙古学者多年来关心此书出版的迫切心情和我的助手、远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工作，却艰难地承受着视力减退的压力，仍业余助译此书的胡尚哲博士那种顽强拼搏精神所深深感动，希望今后受益于此书的学者们，能了解此书得以出版，其背后还有这些为学术繁荣而默默奉献着的人们的帮助！

马曼丽

2014年5月

体例说明

一、考虑到本书为珍贵文献记录,所以,一般采取直译手法,以真实表达原文之意为主要目标,但是又由于古俄文表述的繁琐和原著中有几个文件内容基本雷同,只是由不同部门记录而已,这种时候为方便读者和节省读者时间,我们也采用意译手法加以简化,以避免内容的大量重复。所以全书基本上是以直译为主、辅以少量意译的风格。

二、本书上下两册的原文献分别是 1959 和 1974 年出版的,但现在我们的译文出版时,考虑到文献内容都是延续的,原主编和编著者也为同一班人,我们决定一气呵成,将全部文献以一部书分上下册出版,这样更便于学者们使用。但为了不打乱原著的目录编号等格式,我们将译文目录也分到了书的上下册中,以期用这样既合一又单列的体例使译著与原著更为吻合。

三、人名地名的翻译一般选用学界已经熟悉的习惯用法,当英译《世界地名手册》与《俄汉大词典》译法不同时,一般采用俄译者的习惯译法。如,托博尔斯克与托波尔斯克二者,我们选用后者。

四、原著中档案原件的时间标出的是俄国旧历,但在档案文献的目录中,原编者却有意标出了文件的公元年代以便于研究,由于俄历与公元一年中的 12 个月份不完全吻合,因此文内档案时间的转换容易混乱,译者没有可能逐月细细考证,只能参考目录所标年代对文内重要的一些年月在俄历后标注出公元参考年代,并仍保留俄历,以便学者们今后考证。

五、本书原著作者的注释,原在书后有附录,为文后注,但每页下方也有注,为方便阅读,现在译著中已将附录中的注释全部移至了每页下方。本书注释除译者注外,其余均为原著所有,这是为了避免造成前后均有注释的混乱。另外,在索引中指向 301 - 318 页(上册)的词条,其

所指均分布在文中的页下注中。

六、由于本档案原件分别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人士的口述，所以往往同一地名有可能因方言而拼法不同，给译名造成很多困难，译者已尽自己所能尽力统一，但不可能一一得以考证，所以难免仍有因原文发音混乱造成的个别不够准确的拼音译名，请学者留识别和指正。

译者

2013年5月

畜风若斯欲量少却解。生述畜直以蒙古本译许会以祖。夏董
直庭直，前述出第 4501 例 2221。最晚从满文原书都两不土牛率，二
长山音答诚略嫌生疏，而转被墨略容内满文译出者，体研出文译姑附姓
矣，独出恨不土食牛瑞一以满文请全称，为阿萨一宗央所凭，入模一同
译日矣。大落孚恩译奉日即喜耶布甘不仁氏母。相期以译学于更委眷
身译本而长单又一合译者故用脚注，中册不土西生了撰衣由某日文录

。合购次更春耶已音首
首突当，若即数长的恭恭壁与墨李固奏歌一系而皆含缺音人。三
则区首利斯出采要一，相同不谐。《典向大又始》已《抓手音此界也》
。合译者故用脚注，各得相合。合二支译水照汗已京诚水制汗，或。遂有
目因斯头察音奇母，说印国君最前出者倒挂的音译家台中客源，四
公已见斯干由，武硕王史刻升平示公函其文下出承宣本略音疑制，中东
路昌容通呼拉河来斟肉文出田，合融全族不俗良不。51 韶中平一示
萌娶童内文标升争忍视最目为参前只，而世熙熙具表蒲瓦齐婚音译，措
令国善幸射思，但想留易初共，升平来毫元公出者稿旨很熟亦且半甚一

。五等音
式不真至耳，将讯文式，奉端音节牛直通，骑毛而清非焉通于本，五
不真至耳至尊端全通。51 中朱柳林曰中音弱直通，夷周敷式。音首此
音诵须数重数丁或量多，环浪音限式以余其，但玉音并端麻于本。或其，杀柳林(墨上)页 216—105 同谱中臣墨首，长民，后群如群如音首

《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中文版序

马大正

《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的中文译作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欣喜与欣慰之情难以言表。本书是分别出版于 1959 年和 1974 年的《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1607—1636)》和《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1636—1654)》俄文版档案文献汇集的合译集。本文的译者马曼丽教授嘱我为之书序，我也确有很多与本书有关的话想说，其间既有学人间真诚的友情，亦有卫拉特蒙古研究史中某些值得一记的有意义的片断，当然也有对本书史料价值不可或缺的理性研判和对卫拉特蒙古档案文献收集和中译的期盼。

1975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接受了一项外交部交办的研究任务：准噶尔问题。为此，民族所抽调民族史研究室研究西北边疆的部分研究人员组建了研究小组，我有幸在抽调之列。这是我 1964 年进入民族研究所后参加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在著名民族史学家翁独健教授指导下，研究小组确定撰写一部反映 17 至 18 世纪准噶尔历史的学术专著，定名为《准噶尔史略》。^[1] 研究小组严格按学

[1] 该书 1985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版。

术研究规律有序开展工作,收集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和了解中外学者研究成果是工作首选,且贯穿于研究工作始终。编制准噶尔历史研究书目是分给我的任务之一。1964年出版的苏联学者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引起研究小组极大兴趣,调研中获悉该书已有中译稿,正在商务印书馆审阅之中,也颇费周折得到了一册《准噶尔汗国史》中译稿的油印本。^[1]当年办公条件简陋,办公经费更是拮据,为了让研究小组能人手一份,我们想了一个“笨”办法:人人动手分工复写5份。经过几个月“苦干”,一册《准噶尔汗国史》中译稿油印本,又添了5册手抄复写本。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知《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的译者是兰州大学的马曼丽。随着对中译稿的研读,对译者历史知识积累的丰厚和译文水平的精湛钦佩之情可说是与时俱增!

1979年9月我赴兰州,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兰州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得以结识既是专家又忙于会务的马曼丽。由于是研究上的同行,又都是祖籍浙江宁波的小同乡,由此开始了延续至今已近40载的学人情谊。其间,马曼丽的研究轨迹是:卫拉特蒙古史→西北边疆民族史→中国边疆史→中亚史→中国边疆安全与跨界民族研究;而我则是:卫拉特蒙古史→新疆史→中亚史→中国边疆史→中国边疆学。我有幸与马曼丽教授的研究均是由卫拉特蒙古史起步;20世纪80年代,我们都以各自的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开启与深化尽了心、出了力。“学术界把她(马曼丽)与马大正教授、马汝珩教授并称为国内开拓卫拉特研究领域的‘三马’。”^[2]而且在之后的研究领域延伸中,马曼丽教授和我都离不开中国边疆这个大主题。

[1]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2013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2]徐黎丽:《封面学者——马曼丽教授》,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13年1月。

在学术生涯中,能得如马曼丽教授这样的学术知音,实乃人生之幸事。《康熙文案档译文稿集·中俄关系》将全面系统地展示清廷与俄国的往来。

二

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坚实的资料支撑,研究工作如无源之水,广集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在着手梳理准噶尔历史,进而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时,清朝的档案文献,尤其是满文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有选择地汉译始终是收集资料中重中之重的工作。我们又基于 17—18 世纪准噶尔历史演进的区位特点,考虑到当时准噶尔,乃至卫拉特蒙古的土尔扈特、和硕特诸部,与俄国交往频繁,俄文档案应是又一个需要关注的资料收集重点。这一认识随着对《准噶尔汗国史》中译稿的深入研读,更是不断得以强化。苏联著名蒙古史学家兹拉特金所利用的大量 17—18 世纪的各类俄文原档,成了这部学术专著最大的亮点,尽管兹拉特金的学术观点我们并不全部认同,但作者大量利用的俄国档案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确是一大贡献。我在编制准噶尔历史研究书目过程中先后又发现了《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1607—1636)》和《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1636—1654)》两本俄国档案汇编,我们又从 В. Л. 科特维奇《有关十七至十八世纪与卫拉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献》,М. И. 戈尔曼、Г. И. 斯列萨尔丘克《十七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概述》,Г. И. 斯列萨尔丘克《十七世纪中期俄罗斯与准噶尔往来关系中的档案文书》,奇米特多尔济耶夫《十七世纪末俄罗斯和卫拉特关系的历史资料》等论文中获悉了更多俄国档案的信息,发现上述提及的两册《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档案汇编是最值得重视的,

为此,我们将两册的绪论和档案文献目录进行了汉译。^[1]也即从此时开始,我萌生了组织力量选译或全译《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的梦想,时间在 1985 年前后。

能承担此项重任的除了要有扎实的相关历史知识积累外,具备中译古俄文功力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当时国内有此能力的专家可谓少之又少,马曼丽教授实在是难得的合适人选。为此,我们曾多次商议,终因诸多条件尚不成熟,搁置了下来,一晃 20 余年过去了。

2007 年夏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有意促成此事,在我诚邀下,马曼丽教授虽已年过古稀,仍壮心不已,慨然承担此项工作,项目名称确定为《俄国与清廷、俄国与卫拉特蒙古交往的俄文档案(1607—1654)译文汇编》,并于 2009 年结项,共选译了《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1607—1636)》收录档案第 33 号至 135 号,《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1636—1654)》收录档案第 1 号至第 136 号,中译文总字数约 34 万字。由于项目设计所限,仍未能将这两书收录的档案全部中译,留下了遗憾。

时光又过去了几年,2014 年两册全部档案,能以《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为题名作为余太山先生主编,施援平博士具体操作的“欧亚历史文化文库”选题正式出版,遂了我们 30 余年的心愿,中国学人得以一见珍贵档案之全貌,实是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美事。

三

这部《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所收俄文档案的史料价值以其

[1] 中译稿和上述提及的 4 篇论文的中文译稿均刊印在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主持的“清史译文新编”第 3 辑《卫拉特蒙古历史译文汇集》第 1 册。